《小说创作新论》的实践意义

◎梁一儒

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陶长坤教授，长期从事小说研究和小说创作工作，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小说创作新论》，是他的又一部学术力作，为当今的小说创作学做出了新贡献。该作洋洋洒洒40余万言，全方位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研究论述了小说和小说创作。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，又具有重大的实际致用意义。

按图索骥、照猫画虎，依照某种条条框框写作，从来没有产生过传世名作。因为很简单，小说既然称为创作，它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独一无二、无法模仿、不可重复的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——精神，不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。精神的太阳无论照耀着多少个体，它们都会像露珠那样焕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。但是，小说创作是否无据可依、无师自通，小说家的创作活动像脱缰的野马，任情使性，不受任何约束就能写出伟大作品呢？答案是绝无可能。有些作者，憎恶批评家像鲁莽的锄头，要把禾苗同野草一起锄掉。或者声称，批评像牛虻，总在干扰老牛耕田。事实果真如此吗？世界上任何事物，包括物质与精神，都必然遵循着固有的客观规律发展变化。正如江河必然沿着河床奔流，或湍急翻滚，或静如处子。但是如果溢出河床，洪水肆虐，那就会造成生态破坏，不可收拾。因为客观规律人类无法改变，只能顺势而为。思维规律（包括小说创作）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天马行空，但到头来你还是无法斩断你的根（民族的、时代的生活源泉）。作者引述法国著名小说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话说：“文学创作有本身的内存规律、精神法则。一个作家凭一时的天才就想一辈子在文学社交界清谈文艺，享受天年，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，幼稚的想法……文艺猎奇从来没有创作过任何东西。”

陶长坤先生积数年之功撰写的这部力作，从创作论角度总结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规律，可视为一部切实的小说创作指南。同时，对提高读者的理论文化修养，也大有裨益。就这两方面而言，在这个浮面化、碎片化阅读的时代，对庸碌趋势的浮躁心态，不啻是一剂良药。作者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，此书在总结自身小说创作经验的同时，又旁征博引，运用古今中外小说创作的丰富材料，摒弃陈规俗见，力图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构筑自己的话语体系。

《小说创作新论》最重要的特色和优点就是既有深厚的理论素养，又有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实践意义。该作广泛地采用了各种小说理论，并将古今、中外、传统与现代的小说理论密切结合起来，形成自己独到的小说理论系统。还将小说理论与小说文本小说创作实践结合起来，大量引用和分析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小说作品，且从中升华出诸多新观点，新见解。

我读这部著作的直接感受是：鞭辟入里的批判锋芒，无所忌惮的理论勇气，以及直言不讳的犀利文风。具体而言，本书在知识性、思辨性和创新性诸方面，都取得了显著成就。

作者长期从事高校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，理论素养深厚扎实，积累了丰富的中外文学资料。他中西兼融，取精用宏，尽力扫除某些理论著作的经院习气：枯燥、抽象、沉闷、冗赘，一变而为尖锐、痛快、直白、显豁，仿佛在理论领域吹进了一阵凉爽的清风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，作者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认知与应用，开拓了视野，给这部著作平添了鲜活的时代气息。同那些生吞活剥、囫囵吞枣、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何味的“时尚达人”不同，他不仅注重消化吸收新思想，新观念化为自己的血肉，而且把它们创造性地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（如长篇小说《静静的大运河》）。譬如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、象征艺术、魔幻艺术、意识流、潜意识等解析鲁迅、王蒙特别是莫言的小说均别开生面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。

某些创作经验谈之类的著作往往囿于一己之见，自说自话，把狭隘的心得奉为圭臬，无力把感性描述上升到理论层次。如何以宏观的视野，深刻的思辨，科学地解析中外小说的创作经验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作者的理论素养，首先是他披沙见金、去伪存真的能力。如本书“内篇”对小说内部规律的概括，表面上看似乎并未超越叙事结构、主题思想、人物塑造、语言艺术以及环境意境构造等传统的分析方法，但仔细读来却发现，作者凭借较强的思辨能力，对这些小说创作要素给予了崭新的解释，赋予各个要素以鲜明的理论色彩。特别是思维方式一章，不管作者的见解是否无懈可击，只要看他对两派观点的准确系统的把握，对两种思维方式在实际创作中的运用提出自己的判断，这些都表现出作者深入缜密的思考能力，以及他不愿随乎流俗、攀附名流学者的独立学术品格。

我认为本书的精彩之笔集中表现于对创新思维的独到见解方面。这不单贯穿于各个章节的论述之中，而且特别集中表现于对莫言其人及其作品的评价上。莫言被作者确定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三座里程碑，关键就在创新成就了这位诺奖得主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。作者对莫言的赞美溢于言表，从深刻的创新意识、无畏的创新精神、开放的创新思维和超凡的创新能力四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本人在创新思维方面也同莫言灵魂贯通，论述过程中时时流露出汪洋恣肆的热情与胆识。对作者本人而言，从莫言的作品中似乎找到了一位难得的知己，并借此痛快淋漓地抒发了蓄之既久的胸中块垒，喊出了文坛上少见的“另类”呼声。

一种新观点、新学说，不管包含“合理的内核，真理的颗粒”的多寡却往往命运多舛，既引人注目又激发论争。作者对流行的现代主义理论的评价，对文艺阶级性与人性的理解，特别是对莫言“第三座里程碑”的判定，都可能引发不同意见的争议。我认为，只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公认的批评标准为准绳，平心静气地探讨争论，其结果只能是越辩越明，对学术理论的发展，有百利而无一害。

《小说创作新论》沉浸着作者日以继夜辛勤劳动的心血汗水。这种一往情深、潜心治学的精神，在浮躁风气靡漫的当下，值得大力提倡。

典評

本刊宗旨 WENYIPINGLUN

◎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　◎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

◎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　◎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

◎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

心灵的迁徙与精神的抵达

——评安宁散文集《迁徙记》

◎周其伦

3月19日，我们当年几位知青又一次回到了40年前落户的重庆茶山竹海坡下，站在这块我们曾经触摸过四五年的土地上，每个人的感受自然千差万别，但有一种叫情感的依恋却挥之不去。联想到我近几天阅读到的内蒙古作家安宁的散文集《迁徙记》，更是能够感受到人生历程中那一个又一个的心灵游走历程，作者真诚面对“迁徙”的心路，淡定的叙述中与我内心的波澜彼此呼应，足以让我们领悟到一种有情感温度的精神抵达。

《迁徙记》今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安宁安排了《长在田园》《读在校园》《行在草原》三个大的版块、用10篇各自独立的文章，洋洋洒洒记录着作者在成长、求学、闯荡等各种情态下的微妙心境，清婉的记录与亲和的讲述相生相伴，形象逼真地再现了80后那一拨人内心激荡经年的迁徙流变，在绵密的人性依恋和宽阔的情怀传承上，以点带面地表达出一群人的命运抗争和情感纠结。既是作者心灵迁徙的真实写照，又预示着我们对美好精神家园的垂注与期冀，丰赡的文学况味悄然弥漫。

《迁徙记》落脚于作者内心的个体体验，烛照的却是宽广无比的寻常人家生活情态。“我常常想，我为什么会从山东行至内蒙古，并定居在北疆这片大地？在此之前，乡村长大的我，从未想过会与草原产生交集。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四处旅行的人，大部分时间，我都宅在房间里，读书，或者写作。但我却一直走到了中国的最北方，体验了零下三四十度的高寒，和夏日草原上万马奔腾的辽阔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后，将其归之于命运。”这是作者一段极富感情色彩的独白，文字的肌理纤毫毕现、活色生香，不难品味出她因何迁徙、迁徙何处、以及迁徙对于她抑或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苦苦追求与深深渴望，这里有不安，有躁动，而更多的则是不甘。外面的世界他们未必知道，远处的壮观也并非一定就旖旎美艳，但是他们被“命运”这个最捉弄人的劳什子时刻地左右着，如同有什么奇幻在勾引着人们的遐想，于是迁徙便成为一种常态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。

按照《迁徙记》的脉络，从作家个人的足迹渐渐发力，从安静的田园，到青葱的校园，再到广袤的草原，每一步都云蒸霞蔚，每一步都历尽艰难。书中所选事例代表着作家个人对一代人迁徙历程的思考定位，关涉地理行走，饱含人间观察，既可以看成是一个人迁徙史的娓娓道来，也可以是对大范围多层次迁徙“流动人群”的观察笔记，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从乡村闯荡到城市的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，从精神层面对彼处的一种眺望。

作者认为，每个写作者都具有双重人生，一重是现实，一重是文字，她自己非常自得于自己能够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内心。《长在田园》里，作者是那个孤独的长不大的小女孩，整天就幻想着什么时候，秋收能够结束，大雪覆盖了整个的田野，一切都寂静下来，终于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，可以随心所欲地睡下了。《读在校园》着重描写了她的鲁院生活，就是这方小小的天地里，有最让她喜欢的安静所在，也有了她最虔诚的文学修行。到了《行在草原》，我们就能够读出底层生活的本色和粗粝，这里有浩浩荡荡的马场，这里有冰天雪地的荒原，有与牧民亲密无间的奶牛和羊群。某一个冬日，在附近洒满阳光的河岸上，顺着牧民砸开的厚厚的冰洞，探下头去，汲取河中温热的水，个中的惬意无与伦比。最让作者动心的，是那些无忧无虑的牛羊，它们会在小镇的公路上散漫游走，犹如乡间漫无目沿街而行的孩子。

阅读安宁的《迁徙记》，这样具有洞见力量的文字俯拾皆是：“人类当然没有鸟儿的自由，可以无牵无挂地，从漫天大雪的北方，飞往春意盎然的南方。我们背负了太多的责任与压力，生命中那些理想的去处，到最后常常成了虚无缥缈的空想……那些因旅行而路过的城市，并不能浸润我的灵魂。它们常常以浮光掠影、转瞬即逝的模糊印记，从我的生命中消失。”独特的心灵索求和对人间情怀的追问跃然纸上，让我们不由得对她的作品多了一些艺术质感的认知。作者还力图用情真意切的笔墨凸显出自己迁徙的心路，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国人无数次潮起潮落的迁徙壮阔，文字温暖沉郁还兼具幽默犀利，其个性化强烈的散文风格再次得到了集中展示。

作者的命意还在于从一个更为高远的地方去打量、审视人类永不停息的迁徙步履，用艺术的笔法去探寻铺天盖地的城市化进程，这种发自精神内里的大胆探寻，我个人觉得这才是《迁徙记》的最大贡献。

风赏

本报记者　李新军　摄

白立平歌词的民族性自觉

◎张无为

白立平是赤峰市文艺界多面手，就文学创作而言，他首先是诗人，后转型为歌词作家。

他的诗写从1980年代起步，主要特征介于传统抒情与朦胧诗风之间，并大多从人性立场创意，少数民族题材偶有触及。如《无名的名媛》就写到历史名人张骞的匈奴爱妻，属于作者站在汉文化立场自觉不自觉地借叙事抒情之作。如果在匈奴爱妻身上进一步融入诗意细节以强化其性格亮点，会当平添新光彩。白立平更多的诗表达普适性情感，如1989年发表的组诗，主题是感受日常温情，如其中的《日子》表达如何在日子很紧中安慰母亲的晚年。《那棵树》在“我”与树之间建立诗意契合点，表达青春的憧憬与自信，语言在当时比较前卫。还有《跛者》《希望的深渊》等，诗风大体形成。1997年他的舞蹈诗剧《太阳契丹》主题诗，显示出他自觉地从契丹文化中开掘，有民族史诗的气势与汉赋的铺陈及磅礴的抒情。

在世纪之交，白立平的写作重心从诗转向歌词，与其说和赤峰地域特点及行政区变迁相关，毋宁说是作者的一种新拓展，是另一种进步，《深深眷恋的草原》等CD首发与研讨活动即可佐证。

白立平的歌词能自觉地关注民族性，侧重于展现草原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蒙古族新情怀，集中表现为草原生态下民族风俗与诗性意象，诸如长调歌舞马头琴、敖包哈达奶酒鲜、骏马牛羊勒勒车、雄鹰百灵等，基于游牧传统秉性，又有时代面貌的焕发。其词中主调是人性层面、时代风尚，促成在一唱三叹中或深沉或明快的风格，既为赤峰民族化音乐平添亮点，也融入了自治区音乐发展体系。

中国民族歌曲在改革开放40年有长足的发展，而核心问题依然是处理民族化与世界性及时代共识的关系。少数民族歌曲、歌词同样如此。世界性只吸纳先进的民族文化，不同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才会构成世界文化的五彩缤纷。近年来，少数民族歌曲确有亮点，而找到传统民族音乐与某些现代音乐之间的有机融合点则是关键。在歌词创作上，表现之一应该是民族元素与时代或现代理念的融会贯通。

白立平的歌词在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构思的特质很自觉，有的歌词创作理念也颇具新意。如《绿色的呼唤》以生态意识忧虑草原环境恶化。《等你回家》写家人盼归主题，其特色是在草原生活背景下，通过蒙古族女性口吻所表达的期盼，即妻子对多年闯荡在外的丈夫既殷切盼望又体贴理解。

关于民族化问题，尤其是“还乡”主题，在蒙古族与汉族之间原本差异很大，汉族多基于“乡情”，蒙古族则基于“草原情”。农耕田园与逐草游牧的方式，决定两者的母题不同。近现代以来，彼此虽然有所趋近，但两种民族心理依然有微妙差别。如歌曲《雕花的马鞍》（印洗尘作词）将马鞍与摇篮、金色的童年关联，这是典型的汉族思维方式，应值得注意。以新视角处理旧题材是所有艺术继承与发展的基本方式，关键应找到切入点与创新点并且能经得起诗意推敲。

就目前来看，民族歌曲精品依然有限，部分草原情歌、恋歌还谈不上新意。赤峰音乐在作词、谱曲、演唱、配乐等开发上，在民族、流行、美声等类型上，有底蕴，有生机，有起色。如1940年代的《牧歌》成为民族歌曲标志性经典后，几代音乐人都在扎实奋力，多个新乐队也初露头角。但赤峰音乐依然面临严峻挑战与深层转型的艰难。其实，近年来整个内蒙古的歌手在本地成名的比例尚不高，大多属“墙外开花”，这也意味着赤峰乃至内蒙古在音乐生态建设上需要优化与催动。

推进音乐发展需要各相关部门与民间组织综合协调，从提高整体素质着眼寻找切入点培植，营造品味环境，建立正规评价体系。一首好歌至少需要好词、好曲、好歌手，有综合，有侧重。一般讲，词是基础，曲是锦上添花，歌手是对外窗口。而歌词创作必须在诗或歌的发展层级与缝隙中寻求新意。当下歌词探索的核心应该是拓展世界性与民族化阈值，找到两者之间诗意增长点。

藝覺